李 大 钊

李新　朱成甲

编撰者话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倡导者和开拓者。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团结了一大批以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革命青年,领导了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1920 年后,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发起和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 年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李大钊学识渊博,思想深刻,品德高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革命前途无限忠诚。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为发展共产主义运动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怀念。

家世和童年

李大钊,字守常,1889 年 10 月 29 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生于直隶(今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是大黑坨村有名的好青年、好学生。他聪敏好学，达礼知文，写一笔好字，为乡里所称道。1888 年（光绪十四年）6 月 23 日，渤海湾发生了 7.5 级大地震，乐亭县被震得房倒屋塌。李任荣当时正患病，他不顾危险抢救生母，并把她背着跑了好远，直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李任荣由于在病中受到惊吓和劳累，当场大口吐血，之后病情日益严重，在 1889 年 3 月病逝，年仅 23 岁。这时，李大钊尚未出世。

李任荣的妻子周氏，性情温和、淳厚、善良而又心灵手巧，在丈夫逝世八个月后，生下李大钊，一年以后，她因过度忧伤离开了人世。从此，李大钊就成为失去父母的苦孩子。李大钊是由继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的。李如珍当时已六十多岁，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过继二弟李如珠的儿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夫妇早逝后，就完全担起对孙子李大钊抚养和教育的重任。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在出生后的第二年，母亲又去世了，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①

勤奋学习　　立志报国

李大钊四五岁时，由祖父教他读书识字。六岁起，祖父送他到本村的老谷家读书塾，由单子鳌先生对他开始启蒙教育。单先生为他取名叫耆年，字寿昌，以寄托着对这个不幸孩子的永年高寿的祝愿。

单先生按照传统的科举路子，对李大钊教了约三年。十岁时，祖父又送他到赵辉斗先生的塾馆继续攻读，过了两年多，赵先生也感到自己的学问根底已不能满足这位渴求知识、在学习上突飞猛进的学生的需要。于是，又主动让李如珍为李大钊另请名师。

李如珍终于进了乐亭县城北井家坨的宋举人家的专馆。这个专馆

①《我的自传》，《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4 页。

的老师黄玉堂先生,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学识好,又重视因材施教，从而使李大钊在学习上进步更快。

1905 年乙巳岁,9 月初，李大钊参加永平府科举考试。就在他考试已经结束,只等最后张榜公布、拿回‘府试中’的喜报的时候,清王朝正式废除科举的诏令也到达了永平府考场。几天之后，李大钊没有拿到考上秀才的喜报，却拿到了永平府中学堂一年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

按照清政府政务处和礼部 1901 年 12 月的规定，不同级别学校的毕业生可分别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科举出身。只有‘府试中’够秀才资格的人，才能被录取进入永平府中学堂。从这种意义上说，李大钊参加乙巳岁的府试，是考中了秀才的。他既是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批秀才，又是中国全面实行近代新学制的第一批新生。

李大钊在这里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外的新学——西方的思想文化与自然科学,学习‘夷人’的语言—— 英语,并结识了革命志士蒋卫平(字大同)。蒋卫平比李大钊大七岁,他非常敬慕谭嗣同,决心为祖国独立富强而献身。1910 年 8 月,他到黑龙江国境一带考察,以备抗俄，不幸被沙俄军队杀害，尸体被抛入江水中。

李大钊在 1911 年写的《哭蒋卫平》七律中,写道：

吴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走？断肠风雨上高楼。

李大钊又在《题蒋卫平遗像》的五律中写道：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落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李大钊悼蒋卫平诗，反映了他成长过程中一段重要心灵历程。其实，李大钊只在永平府学堂读书两年，蒋卫平又是从永平府师范学堂中途转学过来的，他们在一起大约只有一年多时间。李大钊对于这位青年志士的认识和感情如此之深，主要是因为他们志趣品格的一致。

按照清政府钦定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学堂的修业为五年，学生的年龄为 16—21 岁。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改革潮流的冲击，李大钊在永平二年级刚读完，即 1907 年的暑假，他便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当时，除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外，另有北洋军医学校和长芦银行专修所也都在招生。李大钊说：“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乃入政法。”①

该校规定：膳食费每月五元，并保证不拖欠。大钊在校六年，均系自费。他回忆说：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②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清王朝培养‘佐理新政’官吏的一所学校，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所创办的。清政府明确规定：学生“不准妄干国政”，只应该‘恪守学规，专精学业’，这就是学生的‘本分’。否则，就是‘妄行干预国政’，就是‘躁妄之徒’，清政府表示‘决不姑容’。

清政府还规定‘：经学为必修课’，以圣贤‘经义’为指导思想，为‘圭臬’，声称这是‘立国之本’。同时又规定，学生不准妄谈‘进化’与‘民权自由’等西方政治学说。否则，清王朝称这是“摇惑人心”的“狂谬之徒”，是‘乱党险人’的行为，将决不给他们‘本于法律’的自由。③ 李大钊急思‘深研政理’所要研究的，很显然决不是清王朝规定的圣贤经义，而恰恰正是他们所最害怕并严加禁止的“摇惑人心”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是属于‘狂谬之徒’的行为。

①《狱中自述》第二稿。按：现《李大钊文集》所收的《狱中自述》为第三稿。对于二稿中所叙述而三稿中却予省略的内容，在注中说明。此处所引，见新编《李大钊文集》第 5 卷，第 437 页，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以下所引同此版本。

② 《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 5 卷，第 235 页。

③《学务纲要》，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第 208 页。

清政府还规定“忠君”为教育的第一要义,声称“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对最高统治者要时怀“天高地厚之恩”。否则,就是“狂悖不逞之徒”,是“自外覆载”[①],统治者将“有理有法”地对他们进行处置。

李大钊爱国救国理想抱负与清王朝的教育方针以及腐朽黑暗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终于使李大钊在进入法政学校以后不久，就在精神上陷于极度痛苦之中。1908 年即入学后第二年,他在《登楼杂感》中写下的两首诗，反映了他当时复杂痛苦的心情。

其一

荆天棘地寄蜉蝣 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

其二

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空荒邱。
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依楼。

在北洋法政学校，李大钊进一步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初步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与工作能力。这个学校，由于它力求接近京师大学堂的培养要求，所以,在课程上是极其繁重的。正科的课程,设有政治学、政治学史、经济学史、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论、大清会典、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大清律例、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

①《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第 22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刑法总论、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外国语等，每周课业达 36 小时。学生刚入学即由外籍老师用外语讲课，日语第一学生每周 12 小时，第二学年 9 小时，第三学年 6 小时。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使李大钊确立了终生研究“政理”，研究社会政治学说学术方向。经过这个阶段的系统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①

1905 年 7 月，清王朝迫于形势决定派五大臣“分赴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表示，将“仿行宪政”。② 清王朝这一决定，是清末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最具根本性质因而影响最大的决定。“仿行宪政”，其核心内容自然是以国会政治（责任内阁）为中心，用它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千年痼疾：君主个人的专制独裁。对清朝这种许诺抱有热情幻想的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士绅和知识界，以直隶、江苏为中坚和先导，以孙洪伊、张謇、汤化龙等为领袖，迅即在全国兴起了请求早开国会的请愿运动。第一次请愿，他们发动了 20 万人签名。第二次请愿，他们发动了 30 万人签名。③ 第三次请愿，他们拟发动 250 万人签名，仍由孙洪伊率领，到北京“伏阙上书”。在请愿中，参与者们痛陈民族危机，谓非如此，中国决不能自保和自救。④ 从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兴起大规模的、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治结社与民主运动。北洋法政学校学生，勇敢地响应了这场运动，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政治运动。

在当时的集会上，李大钊的同学北京政法学校学生秦广礼当场断指，写血书誓志。另一同学孙可君当场断肘，以明爱国轻生死的壮烈情怀。当时会场上鲜血浅地，哭声震天，李大钊的心和这些热血青年的心紧紧地跳在一起。据李大钊回忆：“孙君断肘之后，全身为血所染，许多

①《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 5 卷第 235 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 5564 页。
③《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 645 页。
④《中外日报·要件》，宣统 2 年 9 月 7 日。

同学鼓掌叫唤，都以泪相见。”“那种悲惨激昂的情景，我终身不能忘！”①

清王朝对于当时兴起的请求“早开国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运动，采取软化与镇压的两手反动方针。对于第一、二次请愿，清王朝都肯定其爱国救国愿望，并将预备立宪的年限从 20 年缩短到 9 年，又缩短到 6 年，以示一再让步，但到发动第三次请愿时，清王朝终于“翻脸”，采取了强行解散遣返等压制、取缔措施。据李大钊回忆，1908 年“各省人民都起来要求开国会，运动很激烈，清廷不得已允人民要求。”当时北洋法政学校的学生即“参入要求开国会”的运动。到 1910 年，“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开会，外患有安奉铁路问题发生。在天津方面遂引起学生的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们同学也参入运动。”② 北洋法政学校学生 10 月 17 日听到清廷禁止再作请愿的谕，18 日即一律停课，互商进行办法。19 日晨集合全体及东北学界代表，共数千人齐赴直隶督署，要求直督即日电奏，请于明年即速开国会。总督陈夔龙表示同意代奏。当晚，清廷答复不准其请，并声称“倘有聚众要求，则是藉国会为名，意存扰乱”，就要“严办”。又令各学校监督“转饬学生，一律上课”。但学生没有屈服，21 日晨又集会研究办法。直隶总督和天津道当局，就决定派军警卫队包围学校，进行镇压。在险恶严峻的形势下，李大钊临危不惧，从容镇定地组织学生准备应付事变。幸得当时主张和平解决的绅士从中宽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惨剧③。

李大钊回忆说：“这次风潮，算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介绍。同学订阅该报不少，大家都抢着看报。”《民心报》在《对于政府之民心》一文说：“故为今之计，惟有坚心一志，从事革命，而不为立宪所动摇。”在《留美学生陈君非时的函》中说：“夫政府者，乃所以保民者也。今不能保民，反以害民，是

① 《十八年来之回顾》，《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363 页、第 357 页。
② 《十八年来之回顾》，《李大钊文集》第 3 卷第 363 页、第 359 页。
③《中国纪事·天津学界请愿国会之风潮》，《国风报》第一年第 32 期。

不推翻政府,则吾国决亡。”彼其时辄以‘民权’、‘民权’之声浪,流动于抑塞冥晦之空气中,口于斯,耳于斯,莫不有愉快之感。”①

曾经对李大钊有过重大影响的老师白亚雨，当时是这所学校的史地教员,学识渊博,待人热情诚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京、津、滦州、张家口一带为革命奔走，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最后，从容就义,立而不跑,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并对周围的士兵讲:‘共和大好,我们要为共和奋斗到底!’白亚雨为革命断头流血的壮烈事迹，深深地激励了李大钊，进一步振奋了他献身于革命的意志。

1913 年 7 月，李大钊经过六年的苦读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

北洋法政学校是培养官吏的场所，李大钊本人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的学问才能，早已引起当时政界的要人孙洪伊、汤化龙的器重赏识。因此，他进入仕途，谋取相当职位，营造个人安乐窝，当属不成问题。但是，李大钊决然地舍弃了这种选择。

对于李大钊此时的学识以及他所以作此抉择动因、目的，他的同窗、《言治》月刊另一编辑部主任郁嶷说得更明白深切。他说:‘余与君虽聚处六载，而相与为文字密交，则自今春始。盖往者日敝心力于校课,无暇及是。属毕业伊始,同人组织之北洋法政学成,佥议创《言治》月刊，发抒蕴蓄，且征进德。君翩然起众人中，偕余朝暮经画，首期出版，海内日报杂志转录殆遍，尤以君文为最。同人之交，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君则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贻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而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闳，余于君之行又何克尼也。”②

暑假,李大钊又去北京。这时,在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败。李大钊对曾经寄于期望的“二次革命”的失败感到愤慨和痛心,加之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迫害,他离开北京,暂返故乡,筹

①《论民权之旁落》,《李大钊文集》第 1 卷第 40 页。

②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言治》月刊第 1 年第 4 期。

划着出国去日本。

大钊从故乡回到天津后不久，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新出版的一本反动书籍——《支那分割之命运》。他与北洋法政学会同人阅后“忧于亡国之痛”，立即将它翻译出来，并写了“驳议”数万言，痛斥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谬论。同年 12 月，即《支那分割之命运》在日本出版后的两个月，《驳议》就出版了，并很快地“风行全国”，于 1915 年 4 月再版。

留学东京

1913 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的资助，东渡日本。到日本东京后，他去那里的“游就馆”参观，看到陈列着的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事时，日本从我国掠夺去的物品“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深深感到我国人民必须“痛自振励”，“挽狂澜于既倒”，争取民族的解放！

李大钊准备入早稻田大学。该校入学要求很严，规定中国来的留学生必须先人普通预科一年，再入高等预科二年，然后才能进入大学部本科学习。李大钊由于具有接近大学本科的学历，得以直接进入大学部本科学习。

据早稻田大学“学籍簿”与“大正四年度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第一、二年进级成绩表”记载，李大钊：

入学：大正三年九月十八日，大政一科（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第一学年）学生。

修业：大正四年七月五日。

退学：大正五年二月二日。

原因：长期缺席除名。

第一学年修业时的进级考试成绩，11 科平均分数为 66.9 分，在年级 106 名中排列第 40 名，评为丙等。

1915 年 8 月，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筹安会公开登场，袁世凯的复辟面目越来越暴露出来。从而，在国内和在日本留学生中都形

成反袁高潮。李大钊积极投入并参与领导这场斗争,从 1915 年下半年起上课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到 1916 年 2 月 2 日,被学校除名。

1914 年 4 月,李大钊看到刚出版的第六期《雅言》,上面刊有该刊主编康率群写的《秋桐君之〈甲寅〉出世》一文,李大钊非常兴奋地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笔名秋桐)写了一信。信中说:记者足下: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与足下及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残冬风雪,乃从二三朋辈,东来瀛岛,问难无地,索居寡欢,偶于书廛,得《雅言》读之,知为率群先生所作,则喜。继得《甲寅》出版之告,知为足下所作,则更喜,喜今后有质疑匡谬之所也。……①

章士钊接李大钊信后,即约李见面,进行了亲切交谈,从此成为终生好友,并对李大钊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李大钊投稿来信及相晤,章士钊在建国后曾有回忆。他说:"一九一四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②

1914 年 8 月,李大钊经章士钊之手,首先发表《风俗》一文,这是批评袁世凯的。李大钊认为:当时中国政治腐败,社会人心堕落,是最大的亡国危机。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在朝的"执政者"也就是袁世凯所造成的。

文章说:"今以观于朝,执政之人,则如何者?政如疾风,民如秋草,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攘利之桀,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察祷开淫祀之风,有类好巫;嘉禾锡聚敛之臣,庸尚知俭。"意向既示,靡然同风。少年不以学问为

①李大钊:《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月刊,第 1 卷第 3 号。

② 章士钊为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编写的《序》。

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谗谄而谀,青蝇惑耳,直言谠论,寒蝉销声。”①

李大钊说“: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于亡群。’社会人心不是‘向道义”,而是‘向利禄”,并且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李大钊说“:余若一般士夫,则又鸡鸣而起,暮夜叩门,孳孳焉以求官为业,逢恶为能。势在一党,则蝇附一党;势在一人,则狐媚一人。既以贿而猎官,更以官而害民。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各择其地位之便,从而发挥其才智聪明,尽量以行于恶。”

继《风俗》之后,李大钊又发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甲寅》月刊第一期上,发表章士钊第一篇重头文章,即《政本》。文章开头开宗明义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② 章士钊这两问两答,实际是他反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因而也最为李大钊所服膺,并多次加以引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开始就说,当时中国的问题是,各派政治力量都企图“以力服人”,于是‘政力失其轨,专制炽其焰,而民国之实遂不复举。’究竟怎么办?李大钊说“:深思凝识之士,乃相与探其理而示以道:或昌尚异之说,曰政本在有容;或陈互抵之旨,曰政本在有抗。’李大钊这里所说的‘深思凝识’之士,首先是指章士钊,第二是指张东荪。但李大钊认为,他们‘看眼不同,据理则一。’李大钊强调的是“:顾时至于今,抗能不能,容于何有?这就是李大钊文章的重点所在,故题曰《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运用章士钊的‘政本在有容’的政理原则,不仅继续批评了袁世凯,而且第一次批评了进步党,同时,也批评了国民党。认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好同恶异”,不能容纳异派力量,直至发展到暴力相较量。所以,中国的国势到此种状况,三方面都“应尸其咎”,都应觉悟,都应回到民主政治的正轨上来。作为民主政治的学理,章士钊所说当然也算精粹。但是,在中国当时情况下,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反动封建势力尚占统治地位,并且倒行逆施,无所不用其极。在

①《风俗》,《甲寅》杂志第 1 卷第 3 号。

②章士钊:《政本,〈甲寅〉杂志存稿》(上),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情况下，要想让他也能容纳异派，把自己纳于民主正轨，这当然只能是幻想。

“对抗力”一文的更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对三派政治力量的批判与‘希望’,而在于它对于人民群众弱点的批判和希望。

李大钊认为,在社会所有势力中,只有‘群众势力’是‘最权威’的。这种‘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问题是人民往往还不能自觉,以致这种权威为‘古今雄桀’所夺所用。所以,李大钊说:“吾人生当群众时代,身为到群众分子,要不可不自觉其权威。’雄桀人物,即使如拿破仑,‘群众苟自觉悟,则其势力顿倾。’他们的‘势力’,‘予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李大钊文章所说的‘对抗力’,就是这种作用于政治群众的势力，而张东荪所说的“对抗”则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李大钊在此前的文章中，还没有如此强调群众作用的文字，这应是他探寻救国道路的一个重要新发现。这一个新的政治信念，对他今后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李大钊在对中国几派政治势力批判之后，接着，又对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洋顾问美国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进行批评。所谓中国‘国情’一说,从清末以来就是守旧派反对革新、反对适应世界潮流的藉口,在这里,又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藉口。

1915 年 2 月 21 日，辛亥革命后已经停止活动数年了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重行建立，由评议部和干事长推荐，李大钊被聘请为文事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编辑部主任，主要负责留日学生总会的撰著及刊行书报等。① 1915 年 2 月 11 日,北京英国记者端纳将‘二十一条’原件发表，引起海内外震动。同一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即举行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大会。还在端纳发表‘二十一条’原件前,李大钊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5 月 25 日‘二十一条’正式签字,李大钊又于 6 月写了《国民之薪胆》。

这两篇文章，是用民族的血泪写成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即李大钊所说的“对日关系之痛史”。其中既有历史

①《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务纪要》,《民彝》杂志(东京),第 1 号。

的,也有当前的,即甲午(中日战争)、甲辰(日俄战争)、甲寅(借口对德宣战侵占山东)三事:"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中国人"宜镌骨铭心,记其深仇大辱。"特别是对于"甲寅",即"二十一条",更宜"共未来之薪胆"。①

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的文章主要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对袁世凯政府还寄与希望。在外国侵略者压力面前,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也就是主张拥袁抗日,促袁抗日,一致对外,而不是反袁抗日,倒袁抗日。他在文章中说:"吾国民应以敏锐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他同时也警告政府:"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袁政府如"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② 但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但没有觉悟,与民更始,反而加紧复辟帝制。李大钊从严酷的事实中,终于认清了袁世凯反动的真面目。

1916 年 1 月,李大钊从日本回上海策划反袁斗争,在太平洋舟中写下了一首古体诗,以表明他斗争的情怀与意志。诗中写道:"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采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诗最后说:"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③ 李大钊在诗中明确地称袁世凯是"一夫窃国",是必须征讨的"逆贼",而且时机已成熟,决不可迟疑。回上海两周后,按孙洪伊、汤化龙安排又返回日本,积极参与筹划组织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的两次大会。第一次是 1916 年 4 月 2 日,召开为反袁而殉国死难的烈士的追祭大会,同时筹商声援民军计划,当场还发动捐款。第二次大会是 1916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是为了国耻纪念。两次大会,都发表了《对友邦宣告书》,声明自己的活动方针与政治主张。

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还担任了《民彝》的主编,并亲自撰写一篇重

①《国民之薪胆》,《李大钊文集》第 1 卷第 126 页。
②《国民之薪胆》,《李大钊文集》第 1 卷第 135 页。
③《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李大钊文集》第 5 卷第 252 页。

要文章——《民彝与政治》。该文强调“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以及在政治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则尖锐地批判与之对立的个人崇拜、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论。

在袁世凯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和复辟帝制的过程中，英雄史观曾经起着极大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后，无论是“革命主动之黎孙黄，及居中调停之爱国派，莫不衷心推袁，以为非袁世凯为总统者，则大局必糜烂矣。”① 即使是孙中山也称袁的作用是“英雄造时势，盖是谓也。”② 黎元洪说“项城为救时之英雄。”③ 梁启超希望袁“以一身开中国新英雄之纪元。”④ 总之，中国之命运，人民的祸福，人们认为全系于袁氏一身。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集中对当时为害最深的这种封建政治观念和历史唯心观念进行批判。

李大钊回顾了袁世凯窃权复辟过程中英雄崇拜的严重情况。他说“当时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汁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器之，崇拜之，或曰此吾国之拿破仑也，或曰此吾国之华盛顿也，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就是因为这样，“神奸悍暴之夫，窥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炫罔斯民曰‘吾将为汝作拿破仑也，吾将为汝作华盛顿也，吾将为汝作尧、舜、汤、武也。’”一些“趋承缘附”之徒，颂言斯人为“神武”。李大钊明确指出：“神武之人，兹世亦安有是物？特一群心理，以是相惊，伯之有厉，遂为黎丘之鬼，而‘神武’之势成，生民之祸烈矣。”李大钊深刻指出：“人秉彝之本，无甚悬殊”，“圣智之与凡民，甚间智能相去不远”。世界上“能见人之所不见，知人之所不能知”，“异于常人”的“神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某个历史时期有这种人物，一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条件、社会舆论造出来的。他认为，历史上如果有“超群轶类”的所谓“英雄”，则是“非由时会之因缘，

①黄远庸：《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 1919 年版。
②《致袁世凯电》（1912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全集》卷（二）第 86 页。
③《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三）1914 年版第 24 页。
④梁启超：《盾鼻集》第 21 页。

即在众庶之信仰。”他十分赞赏托尔斯泰的观点“: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1916 年 5 月中旬,李大钊奉孙洪伊、汤化龙之召,返回祖国,到达上海。对于这次留学,他的最深感受是“: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①

返回祖国，决心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

1916 年 5月(大约 17 日),李大钊到达上海,寓于孙洪伊处。孙对反袁斗争很坚决。反袁的护国战争，主要是由进步党（梁启超——蔡锷）与革命党的欧事研究会联合发动的。随着反袁的胜利，进步党（这时，正开始演化为研究系）发展了力量，壮大了声势，决意创办一份大报,即《晨钟报》。进步党人挑选 27 岁的李大钊担任编辑部主任。

1916 年 8 月 15 日,《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实际是一篇发刊词。

发刊词对反袁胜利后的形势充满着乐观与希望。它说：“今者，白首中华垂亡命，青春之中华未孕，旧之黄昏已去，新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所说的‘再造中国”,也就是把白首的中国、古老的中国,改变为青春的中国。李大钊认为，中国最大的弊病是衰老、僵化和守旧，而最缺乏、最需要的则是青春的活力与朝气。所以，李大钊理想的中华，也就是青春的中华。而这种青春中华的创造，则赖乎先进文化，赖乎思想启蒙与人的自觉与解放。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有志于通过这张报纸,在中国发动一场新思想、新文艺运动。他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

①《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 5 卷第 235 页。

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证诸欧洲的历史,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法国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的启蒙运动,德国海涅、歌德的青年德意志运动,都充分证明这样一个历史真理。李大钊兴奋地说:“记者不敏,未擅海聂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

李大钊本想在《晨钟报》大干一番,但因政界两派矛盾激化,重新当上众议院议长的进步派汤化龙日益排斥打击接近民主党的孙洪伊(先被任命为段内阁教育总长,继改任内务总长)。李大钊因与孙一致,不愿意将报纸作为汤攻击孙的工具,遂决然辞职。1916 年 9 月 5 日,李大钊在该报发表启事,声明“以私事萦扰,急思返里,爱请社中另请明达。”今后“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李大钊从受命创办《晨钟报》到声明此后“概不负责”,前后时间大约两个多月。在发表离职声明前两天即 9 月 3 日,李大钊发表了寓意小说《别泪》。

《别泪》以“华氏”为主体,说他是“神京世族”。在流衍中分为甲、乙、丙三支。甲支,作者暗指官僚派或北洋派;乙支,作者暗指孙中山革命派;丙支,作者说他“多文弱书生,尚清淡,喜批评是非,文人墨客,常接近之。”暗指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派。

李大钊还虚构一少女桐子(暗示自己),与丙支中的少年迪穆有过恋爱关系。现决心与其断绝,作临别的赠言,指出:“君子昔时,不曾失足与彼辈为伍,助异姓之豪强,倾轧同辈”。这是指梁、汤曾支持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人。最后说:“妾今行矣,但祝君子此后之行动,勿过于随波逐流,于断崖绝壁之前,稍一自持。”不要“遽欲从人以促其再演”。桐子说“自己少年‘幼孤’,因‘迪穆善视之’,才‘以身相许’。只因迪穆“仍欲亲近甲支,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才“决然去而之他”,这时“声泪俱下”。

因此时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派正在投靠代袁而起的段祺瑞,李大钊便以《别泪》这一特殊的形式向世人表白自己与梁、汤进步党人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它极其深刻地反映李大钊追求真理、坚持正义,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个人的恩怨之上的崇高品格。

李大钊离开《晨钟报》,使他试图藉此阵地倡导新思潮.新文艺运动的计划，归于落空。这是他归国后创造青春中华理想的第一次挫折。

李大钊脱离《晨钟报》以后,与几位友人又办起了《宪法公言》报。因为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必须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工作，这也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该刊章程规定：“本杂志旨在阐明宪法之精微，助长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实现一尽善尽美之民国宪法。”

李大钊在《宪法公言》上发表五篇文章，其中有三篇是直接讨论宪法问题的,即《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发表了很有学理价值、很有分量的主张，但不为新旧思潮两派接受。

1916 年 9 月 5 日召开制宪会议。会议当中，段祺瑞操纵的“督军团”干政,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1917 年 6 月 13 日,国会被迫解散，这次制宪工作也归于流产。而李大钊等苦心经营的《宪法公言》因经费问题,在此之前,即 1917 年 1 月 10 日，就宣告停刊。因此，李大钊的理想又第二次受挫。

《宪法公言》结束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日刊于 1917 年 1 月 28 日创刊。应章之聘,李大钊又到《甲寅》日刊做编辑工作。《甲寅》日刊时期的章士钊，已远非《甲寅》月刊时代可比。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倾向拥段，在思想文化上亦转向保守，因而李大钊的处境极为艰难。

李大钊特别关注欧战情况，尤其是社会党的和平反战运动。继而，他又特别关注俄国二月革命,发表《俄国革命的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通过对于俄国革命的研究，李大钊进一步坚定了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前途的信心。他说：“吾国改建共和以来，国中犹有一部分人，对于共和政治深抱疑虑，此无须讳言者也。……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不可尝试。苟尝试焉，必且撄国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此则宜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者也。……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